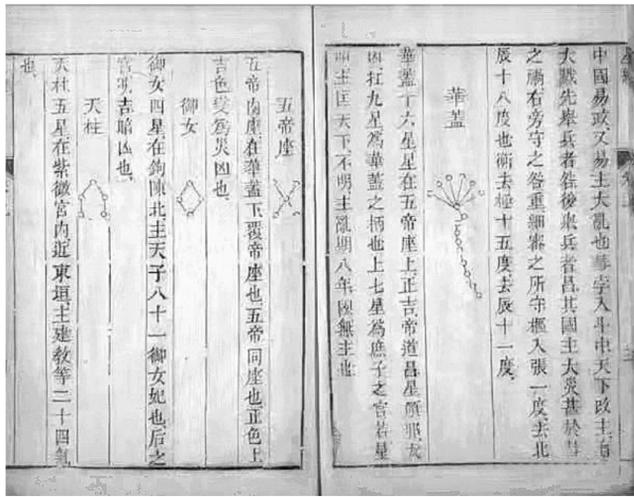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春秋战国时期，以牛耕、铁器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不断发展，集中反映到政治文化上来，尤其在文化上体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世景象，而天文学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在世界天文史上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指出：“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苾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其中，齐国的甘公及魏国的石申，就是战国时代两大天文学家。对此，《晋书》有着同样记载，“其诸侯之史，则鲁有裨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这里的甘德就是《史记》中提到的甘公。



因年代过于久远，关于甘德的属国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记载与争议，其中《史记·天官书》记载甘德为齐人，刘宋裴驥在《史记集解》中记录为鲁人，《史记正义》则提出为楚人，并由《汉书》和《三国志》沿用，称其为楚人。由《汉书·律历志》将两人的天文著作合为一书，并在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正式命名为《甘石星经》。其中，甘德写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写有《天文》八卷。

该书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也是命运多舛，历代屡有篡改增删，现存民间流传的抄本已不是原文。原书词意较浅，也很简略。《汉书·律历志》记载这部书有各八卷，到《隋书·经籍志》记载只有

各一卷，到唐以后此书就完全散佚了，仅在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中保留有一些片段，现版本大都由唐代人整理抄成，但到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仅保存了它的梗概。然而，此后《甘石星经》在流传中有着越来越多的版本。如元朝末年陶宗仪的《说郛》中收录的；还有明崇祯中期毛晋的《津逮秘书》本，由毛晋收录并刻印，又名汲古阁本；此外还有《五朝小说》《道藏义》等也收录此书。这些版本都称《甘石星经》为《星经》或《通古象历星经》，虽然各种版本卷数有多有寡，但内容都完全相同，附有的星座图形也相似，只是次序互有先后，这些版本应当同出一源，源于原本《甘石星经》。

通过流传版本以及相关古代天文资料保存的内容可知，《甘石星经》以甘德、石申两人记录的关于宇宙星系变化情况为主要内容，反映了战国时代天文学成就，是世界上最早成书的恒星和行星的观测记录。《甘石星经》中的《甘石星表》最早记录了恒星变化位置图表，石氏部分包括二十八星宿、中官与外官；甘氏部分则系统记录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了五大行星的出没规律，记载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测定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方位。如《甘石星经》称北斗星为北斗七星，视为天帝的星君，“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冲，齐七政，斗为人君号令之。主出号施令，布政天中，临制四方。”

当然，中国古代的天文记载更多的是运用其来占卜，《甘石星经》中的关于天文、气象记载也不例外，具有历史局限性。如对于北斗七星的记载明显附有占卜之意，“守斗西，大饥，人相食。守斗南，五果不成。五星入斗，中国易政，又易主，大乱也。彗孛入斗中，天下政，主有大戮，先举兵者咎，后举兵者昌。其国主大灾，甚于彗之祸”。显然从记载来看，关于北斗七星位置转辗赋予更多国家时运的预测，这里也涉及了彗星。事实上，这种通过天象变化占卜国运的文化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生产力极不发达情况下的一种特有文化方式，如西汉诸帝还好言谶纬，将一些天文现象牵强附会，妄言兴衰，宋代禁止流

传，纬书中也保存有春秋战国时的天文资料。

《甘石星经》中的《甘石星表》所载星座的测量形式，是中国天文测量学上独特的赤道坐标系。这个星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测编的欧洲第一恒星表大约早二百年，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甘石星经》的数据。《甘石星经》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高度，同时也影响到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秦始皇造阿房宫和建造骊山陵墓，就采用了天文学的知识，两座建筑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西汉武帝元年重修长乐宫，将城垣提高三丈，“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旧京城为斗城”。在西汉陵墓壁画中也有相当精彩的星象图，最有名的是河南洛阳西北郊西汉墓中的壁画天文图。

春秋时期的天文成就由此奠定了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影响深远，“其巫咸、甘、石之说，后代所宗。暴秦燔书，六经残灭，天官星学，存而不毁。及汉景武之际，司马谈父子继为史官，著《天官书》，以明天人之道。其后中垒校尉刘向，广《洪范》灾条，作《皇极论》，以参往之行事。及班固叙汉史，马续述《天文》，而蔡邕、淮南各有撰录，司马彪采之，以继前志。今详众说，以著于篇”。显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成就中当属《甘石星经》最大，同时该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

(据《学习时报》)

读史忆人 典故

为抗日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童长荣

童长荣，1907年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14岁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童长荣积极参加学运斗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踏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与东京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6年春成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1928年5月，日军枪杀中国军民，制造了“济南惨案”，童长荣领导爱国志士组织“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活动，遭到日本当局逮捕，后被驱逐出境。

1928年，童长荣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进入关键时刻，为加强对东北抗日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抽调大批骨干力量紧急赶到东北各地。童长荣等人第一批接受发展武装斗争的任务，被任命为东满特委书记。

在艰苦卓绝的东北地区抗日战争中，童长荣组织创建反日游击队，团结各方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为东满后来的抗日奠定了良好基础。童长荣非常重视东满地区的党团组织，形成了县委、区委、游击大队的党委会，中队的党支部，小队的党小组等比较健全的组织网络。到1933年3月，东满地区党员人数已达到1200余人，几乎占当时东北党员总数的一半，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令人钦佩的是，1933年前后，东满特委与满洲省委有近一年时间联系几乎中断，年轻的童长荣完全凭着自己多年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素质、辨别能力，独立支撑着东满的抗日局面。

然而，童长荣积劳成疾，患有严重肺结核病，几次大口吐血，生命垂危。1934年3月21日，身患重病的童长荣和部队被敌人包围，他坚守在阻击敌人的一线，腹部中弹后仍继续战斗，直至牺牲，年仅27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称他是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据《人民日报》)

熊雄：不应忘却的黄埔精魂

熊雄(1892年—1927年)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并先后追随李烈钧、孙中山等人参加讨袁、护国、护法战争。1925年9月，在海外求学的熊雄奉调回国，被分配到黄埔军校，先后担任政治总教官、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1927年1月，他出任黄埔军校第七任政治部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军校的主要负责人。

史料记载，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熊雄制定、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并亲自讲授“军校中的政治工作”等课程，聘请谭延闿、萧楚女、高语罕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还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到军校作政治讲演。同时，创办《黄埔日报》、“血花副社”，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出了一大批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事政治干部，为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

程正瀛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见熊秉坤，很高兴地向旁人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不过，真正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是程正瀛，熊秉坤也从来没有将这份功劳据为己有。

熊秉坤在1918年时曾写过《武昌起义谈》，对此有详细记载：起义当晚，工程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带兵巡哨，发现金兆龙、程正瀛等人正擦枪装弹，就斥责说：“你们想干什么？”金兆龙一语双关地说：“预备不测。”陶启胜大怒，抓住金兆龙说：“你想造反

“熊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是江西省有影响力的革命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江西省宜春县史志办主任易小良说，对熊雄烈士事迹的整理研究工作最早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2012年，宜春县熊雄研究会成立，关于烈士的研究工作开始兴起。

熊雄烈士的侄孙、宜春县熊雄研究会秘书长熊七光坦言，以前只知道族中先辈是周恩来总理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同事。“加入研究会后，我才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逐渐感受到一个革命家的初心与信仰。有这样的烈士爷爷，我很骄傲。”

1984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崇璘元帅亲笔题词——“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据《光明日报》)

吗？”金兆龙说：“反就反，你能怎样？”陶启胜叫护卫逮捕金兆龙，金大呼：“再不动手，等待何时？”程正瀛持枪射击，打中了陶启胜，陶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家中。程正瀛不仅开第一枪打伤陶启胜，随后还击毙了前来弹压的阮荣发、黄坤荣、张文涛三人。听闻枪声后，熊秉坤才赶来，还大惊：时辰未到，为何枪响？无奈，事已至此，只能提前起义，随后熊秉坤对空连放三枪，鸣哨集合队伍。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据《天津日报》)

瞿秋白关注语言学

大家都知道瞿秋白是一位革命家，其实，他还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瞿秋白在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这种敢于探索、勇于革新、锋芒毕露、所向披靡的精神，显现出一个语言理论家的思想特色。

前人的经验教训启迪了瞿秋白汉语革新的思想。明朝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一卷《西字奇迹》，这是中国第一份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自此以后，为帮助西洋人学习汉语而采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尝试，给了中国的文字学者很大的启示。

国外文字改革的经验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到达苏俄，在苏俄的几年中，他除担任新闻记者外，还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担任翻译。当时苏俄在文改中用拉丁字母创制少数民族新文字并取得扫盲工作巨大成就的经验，深深吸引了瞿秋白。他开始注意研究中国文字怎样用拉丁字母拼写，并在业余时间做了两大抄本。

国内革命形势增强了瞿秋白文字改革的决心和使命感。瞿秋白回国以后，正值文艺界开展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开展文艺大众化，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高潮时刻。瞿秋白在遭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打击，转移到文化界工作以后，参与并领导了这些斗争，并配合党的武装斗争争取到了文化战线上的胜利。当时，他围绕语言文字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从而构成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部分。(据《学习时报》)

关于茶的那些奇特“别称”

“水厄”走红 缘起晋阳侯王濛

人们给茶起别称，一般都取其清新淡雅之特点，但是，茶还有一个寓意似乎不太好的别称——水厄。三国魏晋时期，“水厄”一度成为达官显贵交际圈里的流行热词，甚至对历代诗人影响挺大，在文学创作中也频频用到该词。那么，让“水厄”能够蹿上热词榜的是何人呢？

先简单介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发展的一个大致背景。那是个分裂动荡、政权不断更迭的年代，整个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状态，中国茶文化就在该时期萌芽及起步发展。南宋张昞所著《云谷杂记》记述：“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欧阳公集古录跋云，茶之见前史。自魏晋以来有之……但当时虽之饮茶，未若后进之盛也。”

大约在东晋时期，安居江南的富庶之士，开始喜欢在青山秀水之间清谈，茶自身的清雅内蕴，被一些文人雅士发现，遂将之作为精神寄托。王濛(公元309年-公元347年)生于门阀贵族“太原王氏”家族，晋穆帝永和年间被封为晋阳侯，擅长书法、绘画，与同时期的刘惔、桓温、谢尚并称为“四名士”，亦被誉为“永和名士”的冠冕。王濛特别嗜茶，经常分享给别人，家里来客人时，他必以茶热情款待。

但，也不是所有人同王濛一样爱喝苦涩涩的茶。当时，社会饮茶习俗还没广泛流行，茶饮制作多为大杂烩式的煮饮法，士大夫中有很多人其实喝不惯茶。因此，每次拜访王濛时，大家就非常害怕，因为不好驳主人面子，往往皱着眉、恨不能捏鼻当汤药灌下。长此以往，大家一听说“王濛有请某某”，便打趣对方：“今日又要遭水厄了！”

“水厄”一词由此而来。三国魏晋时期，起初不习惯喝茶的人往往就戏称茶为“水厄”，后亦作为“嗜茶”的代称。再之后，这个叫法越来越流行，常常现身于宋代诗词中，尤其在茶饮之风盛行的宋代，如欧阳修《次韵再作》中写道“客遭水厄疲捧碗，口吻无异蚀月蟾”，黄庭坚《答黄冕仲索煎双井》中的“不嫌水厄幸来辱，寒泉鼎沸听松风”，又如楼钥《次韵黄文叔言送日铸茶》中所写“七碗自煎成水厄，笑看腹似支离瘦”等等。

说到茶的别称，古人可是为它取了一箩筐的名字，如叶嘉、玉川子、清风使、漆烦子、云华、月团、碧霞、玉蕊、雪芽等等，不仅好听还极富诗意。但是历史也有一些听起来和茶扯不上关系的别称，让人乍听起来摸不着头脑，究竟它们和茶有哪些渊源呢？

琅琊王氏后裔 王肃与“酪奴”

历史的指针转至公元493年，因朝廷政治斗争激烈，高门“琅琊王氏”后人王奂和几个儿子被齐武帝萧鸾灭口，王奂的儿子王肃化装成僧人向北方奔逃，并投奔了北朝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而“酪奴”这个茶的别称，就是由王肃得来。

东晋南朝，南方饮茶之风远甚北方。南齐武帝临终遗诏，“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如西家约祭。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饼、茶饮、干饭、酒和脯(肉干)应该是当时南方通行的饮食。同时期的北方流行的饮料则是奶制品“酪浆”。

王肃刚到北魏时，吃不惯北方的奶酪和羊肉之类，而常吃米饭、鲫鱼汤，渴了就喝茶。当时的鲜

不吃柑橘 皮光业偏喝“苦口师”

“苦口师”之名源于晚唐文学家皮日休之子皮光业。在大唐数百位诗人中，论茶诗之创作能力，其父皮日休可以排得上前三，他的《茶中杂咏》组诗与陆龟蒙的《奉和袭美茶具十咏》，是诗歌中难得一见的唱和诗，形象地描绘了唐代茶文化的事实，为后世对于茶叶文化和茶叶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皮光业自幼聪慧，十岁能作诗，颇有门风。他容貌俊秀，善谈论，气质倜傥，如神仙中人。皮光业是一位资深的茶客，深得其父真传，也极其懂茶、爱茶。吴越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在他做丞相期间，表兄弟邀他品尝新柑，并设宴感情款待。

聚会那天，朝廷显贵云集，筵席殊丰。本来是品柑橙之宴，皮光业却不顾眼前美食美酒，也一眼不瞧新鲜可口的柑橙，进门就大呼“我要喝茶！我要喝茶！”于是，侍奉的下人赶忙端来一大海碗的茶汤，皮光业也不顾丞相的威仪了，捧着碗来就是一顿猛喝。随后，他即兴吟诗道：“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席间众人笑说：“此师固清高，而难以饥也。”茶有“苦口师”之雅称，典出于此。

(据《北京青年报》)



茶叶有许多有趣的别称。(新华社资料图片)

卑贵族取笑他茶一喝就是一斗，还给他起了“漏卮”外号。后来一次宴会上，王肃反常吃了很多羊肉和奶酪。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就问：“和你们汉人的口味相比，羊肉鲫鱼汤，茶和奶酪，哪个好？”

面对突如其来灵魂拷问，王肃机智答道：“羊是陆地上最美味的食物，鱼是水里最鲜美的食物。个人喜好不同，两个都是珍味。如果凭借味道比较，没有谁优谁劣。羊就好比是齐、鲁等大国，鱼则像郑、莒小国。”这时他又说：“唯茗不中与酪作奴。”关于这个说法，王肃可能玩了把文字游戏，一方面，让大家听起来像是在讨好皇帝，说茶是酪浆的奴隶；另一方面，其实可以理解成只有茶不是给酪浆做奴隶的。



成都博物馆“空明流光——宋瓷、五大名瓷特展”上展示的茶具和介绍古人制作茶饮的视频。